

评述邓小平

饶银华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评述邓小平

饶银华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评述邓小平 / 饶银华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 - 7 - 5073 - 3935 - 2

I. ①评… II. ①饶… III. ①邓小平 (1904 ~ 1997) —传记

IV. ①A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8016 号

评述邓小平

著 者: 饶银华

责任编辑: 张文和

装帧设计: 陈丰林

出版发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100017

网 址: www.zywxpress.com

电子邮箱: zywx5073@126.com

销售热线: 010 - 63097018、66183303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阳光图文设计中心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700 × 1000mm 16 开 19 印张 230 千字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73 - 3935 - 2 定价: 49.00 元

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远涉重洋确立信仰 / 001

- 一、家世简介 / 001
- 二、求学岁月 / 004
- 三、赴法勤工俭学 / 010

第二章 历经磨难投身革命 / 023

- 一、转赴莫斯科 / 023
- 二、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长 / 030
- 三、中共中央秘书长 / 035

第三章 雄关漫道曲折前行 / 045

- 一、领导广西百色和龙州起义 / 045
- 二、率红七军转战千里 / 058
- 三、苏区“毛派头子” / 071
- 四、长征“跟着走” / 085
- 五、参加红军东征和西征 / 095

第四章 立马太行抗日烽火 / 105

- 一、初上抗日战场 / 105
- 二、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 113
- 三、战斗在太行山上 / 128

四、应对困难局面 / 142

五、走向抗战胜利 / 161

第五章 中原逐鹿所向披靡 / 182

一、发起上党和邯郸战役 / 183

二、奏响战略反攻序曲 / 195

三、千里跃进大别山 / 207

四、坚持大别山斗争 / 220

五、中原逐鹿 / 232

六、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 / 242

第六章 挥师江南解放大西南 / 256

一、指挥渡江战役 / 256

二、出席新政协筹备会和参加开国大典 / 268

三、进军大西南 / 275

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 289

第一章 远涉重洋确立信仰

一个伟大人物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学习、志向、努力和社会实践等因素密切相联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者邓小平，也不例外。从牌坊村私塾的启蒙教育到望溪乡初级小学堂读书，再到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和县立中学学习提高，最后远赴法国留学继续深造，邓小平通过努力学习，不仅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学问知识，而且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从而为其后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作出卓越贡献，打下了比较深厚的基础。

一、家世简介

邓小平，原名邓先圣，于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州望溪乡姚坪里（现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一个小地主家庭。据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著的《邓小平自述》一书记载，邓小平胞弟邓垦谈家世时说：“我们家是个小地主，破落地主，只有40亩地。40亩土地，在我们那里叫两百挑。”

邓先圣的祖父邓克达、祖母戴氏，本为穷苦人家，房无几间，地无几亩，但他们为人勤劳而简朴，还靠纺线织布等方式积攒家业，其后置下田地十几亩，家境逐步殷实起来。

邓先圣父亲邓绍昌，字文明，其时的人们都普遍叫他邓文明。根据邓小平家氏谱图记载，那时邓家的组成是比较复杂的，邓绍昌先后娶过四位妻子：她们是张氏、淡氏、萧氏和夏伯根。邓绍昌第一位妻子张氏，婚后不到两年就去世了，没有生儿育女。第二位妻子淡氏，生了三子二女，长女邓先烈，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次子邓先修即邓垦，三子邓先治即邓蜀平，次女邓先珍（10岁时病死）。第三个妻子萧氏，为邓家生了第四个儿子邓先清后不久就病死了。第四位妻子夏伯根，与前夫生了一个女儿后其夫病死了，她便带着这个女儿改嫁给邓绍昌，她女儿的名字也随之改为邓先芙，并且又生了两个女儿邓先蓉（10多岁时病死）、邓先群。邓小平等率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12月解放重庆以后，他把继母夏伯根从广安老家接到重庆，其后夏氏一直和邓小平一家住在一起，直到2001春去世。《邓小平自述》一书记载，邓垦谈到其继母时说：“夏伯根，劳动家庭出身，很能干，身体也很好，她跟我大姐的年龄差不多。她任劳任怨，大哥家的几个孩子她都带过，后来又江西待了3年。……大哥家的几个孩子都很喜欢她，她也离不开孩子们，她对邓家是有功的，作出了很大贡献。”

邓绍昌曾在成都法政学堂念过一年多的书，接受了一些新式教育，虽算不上一个知识分子，但毕竟见过世面，加之为人豁达、交游甚广和思想开明等，因而在当地称得上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他还当过望溪乡哥老会（清末和民国时期民间帮会组织）的首领，辛亥革命爆发时期参加四川革命党人起义，并在1914年左右担任广安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其家业更加兴盛，最多时拥有40亩田和几万株桑。《邓小平自述》一书记载，他的父亲除了挣来的钱“可以补助家庭的需用外，还有每年几十石租及几万株桑的收入”，“所以家庭当时的生活可谓

丰满已极”。邓绍昌因在广安任职时，得罪了一些政界人士，这些人使他不能在当地立足，他便逃难在重庆七八年，很少回家，但和家里人有通信联系，最后在1936年不满50岁时客死他乡，其家庭经济也随之逐渐破产。《邓小平自述》一书记载，邓小平胞弟邓垦1994年5月回忆其父亲说：“他属于旧社会的人，有旧社会的一些坏东西，坏作风。但他对旧社会不满，对我们兄弟俩参加革命，一直采取支持、拥护的态度，从来没有反对过。”邓小平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一书中说：“我爷爷这辈人，真是没有福气，他们生于乱世，长于乱世，终于乱世，连一天的太平盛世都没有赶上。”

邓先圣生母淡氏虽然不识字，但为人贤惠能干、通情达理、尊敬长辈和爱护晚辈等，把家中的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成为远近闻名的贤妻良母。淡氏对长子邓小平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邓小平自述》一书记载，邓小平说：“我的父母之爱我犹如宝贝一般。因为我自幼时资质就颇聪明，他们的爱我，自然是对我有很大的希望，希望我将来能够做官发财，光耀门庭，改换祖宗。”邓垦回忆说：“我母亲也非常爱小平，他是长子。当时因为我们家里困难很多，父亲长期不在家，当时维持这个家庭是困难的。她就是希望小平长大了以后，来管理家事。”《邓小平自述》也有记载，邓垦回忆说：“我的母亲生了我们5个孩子，同时要承担全家里里外外的繁重事务，得了痼病，吐血，1924年左右就去世了。”

邓先烈比邓先圣大两岁，嫁给了一个姓唐的地主，唐家比邓家富裕多了。她在解放后长期住在重庆，直到1997年去世。邓先修即邓垦经过多年求学之后，于1939年进入延安抗大学习，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解放后先后担任过重庆市副市长、武汉市副市长和湖北省副省长等职务。邓先治即邓蜀平解放前

抽点鸦片烟，解放后接受了一些思想政治教育之后，一直在贵州省六枝地区做点一般性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期，因本人的地主成分和兄长邓小平的遭遇受到牵连，被迫害致死。邓先清从小身体不好，解放后一直在四川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邓先芙解放前夕在读中学时就和地方党组织有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入西南局开办的西南军政学校学习，毕业后主要从事机关的机要工作，其后曾任四川省政协委员等职务。邓先群解放后随邓小平一家到了北京，中学毕业以后考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除了“文革”之外一直在军队工作，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等职务，并被授予少将军衔。

据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一书记载，邓先圣之父邓绍昌那一代是单传，但到了邓先圣这一代及下一辈，已是人丁兴旺，甚至数不清有多少人了，仅邓先圣和卓琳夫妇就养育了邓林、邓朴方、邓楠、邓榕（小名毛毛）和邓质方。

二、求学岁月

1909年正月，邓先圣5岁时进入本村一所私塾就读，开始接受启蒙教育。据《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记载，塾师认为“先圣”这个名字对圣人孔夫子有不敬之嫌，便把先圣改名为“希贤”，因而邓先圣又叫邓希贤，并且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1927年。前英国驻中国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在《邓小平传》一书中说：“邓文明为他的长子取名为希贤，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渴望’和‘善良’，寓示有才智。”理查德·伊文思的以上说法有误，前述已说过是塾师而不是邓文明为其子邓先圣起的“希贤”这个名字。

邓先圣在私塾所学的启蒙功课，主要是诵读古代儒家经典

诸如《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等，还练习毛笔字。

在私塾念了一年多以后，邓绍昌于1910年在邓希贤6岁时将其送到望溪乡初级小学堂读书，去接受新式教育，所学的主要科目有国文、算术、体操和图画等。

邓希贤少年时期，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但他本人衣食无忧。据邓希贤于1926年1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记载：“我从母胎坠下来直到我16岁出国时的生活都是过的很自由很丰富的生活——贵公子的生活”。尽管这样，广大劳动人民其时所遭受的疾苦不可能不在他幼小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于1905年8月在日本发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随后国内很多省份都建立了该会的分支机构开展活动，四川就是其中的省份之一，广安也有类似的组织。1911年5月，四川、广东、湖南和湖北等省民众为抗议清政府将川汉和粤汉两条铁路的修筑权抵押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爆发了被称为武昌起义前奏的保路运动，尤以四川最为剧烈。广安各界进步人士和群众也加入其中，就连在望溪乡就读的邓希贤也和同学们一道唱《来日大难歌》等，号召民众参加保路运动，反映了邓希贤早期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受其影响，川东北的革命党人于11月下旬发动武装起义，并占领广安县城，宣告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受到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邓希贤之父邓绍昌等人和一些哥老会成员也加入了起义军的行列，还当上了相当于排长的基层指挥官。邓希贤不仅目睹了这一切，还到其父亲队伍驻扎的地方住了两天。据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上）记载：“辛亥革命的时候，我的父亲才7岁，因为爷爷在革命军的寨里驻扎，父亲还曾去过

那里，住过两个晚上。虽然那时父亲还小，但我想那种革命的气焰一定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浅的印象，因为直到今天，他还记得这件事情。”

1915年秋，邓希贤11岁时考入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住校念书。这是该县唯一的一所高小，因而要进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上）一书中回忆说：“想必父亲小时念书用功，所以得以考进高小。”学校开设的主要课目有国文、算术、理科知识、史地和修身等，这使邓希贤知识面进一步扩大。

1918年夏，邓希贤14岁时从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考入广安县立中学。该校所开设主要课目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数学、博物、化学、物理和体操等，这使邓希贤知识面变得更为广阔了。通过私塾、初小、高小和中学等阶段的努力学习，邓希贤打下了比较深厚的学问基础，这是他其后能够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并作出卓越贡献的重要前提条件。

邓希贤在努力求学的同时，其爱国主义思想也变得更为强烈了。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随后影响到全国。广安县立中学和高等小学堂于5月下旬联合成立学生爱国分会，邓希贤加入其中并和其他学生一道，组织游行、集会、宣传、罢课和抵制日货等活动，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改变中国的专制制度和落后状况，却促使中国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在对当时世界各先进国家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认为，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比较彻底的国家，科学技术也很发达，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思想深入人心，生活费用也相对低廉，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在华大量招募华工等，因而吸引了不少中国进步青年留法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参加过辛亥革命而被迫流亡国外的中国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诸如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前加入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成为中共党员的“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等，于1915年6月在巴黎组织了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目的，号召国内进步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第二年又成立了华法教育会作为留法勤工俭学的办事机构。蔡元培和吴玉章回国以后，于1917年在北京组织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作为经办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总机构。随后上海、成都、重庆、长沙、济南、天津和武汉等地开办了各种形式的留法预备学校和预备班。

从1919年初到1920年底，国内先后有17批次、1600多名学生赴法，其中涌现出了诸如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维汉、王若飞、李立三、向警予、陈毅、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和蔡畅等一大批先进分子。他们通过勤工俭学的实践，不仅了解了西方社会先进的科技文化，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相继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其后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文已谈到，邓希贤之父邓绍昌因在重庆避难多年，才知道有留法勤工俭学一事，便托人带口信给广安老家，叫其子中断中学学业去重庆报考留法预备学校，将来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出洋深造，这一决定改变了邓希贤的一生。据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的《邓小平纪事》一书记载：“邓绍昌做出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决定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是在成都受到几年新式教育的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对军阀统治、教会横行不满，希望儿子到欧洲学点真本事，将来能够光耀门庭，报效社会和国家。”

邓希贤能够出国留学，显然是非常高兴的，关于其出国动因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工业救国思想。1964年2月16日、17日，邓小平会见泰国前总理乃比里时说：其实我们当时去法国，也只是抱着一个“工业救国”的思想。当时我才16岁，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想出洋学点本领，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国。学者龚育之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由来和特色》一文中也持有这种观点，并引用邓小平晚年回忆留法勤工俭学一事时说：我们看到中国当时是个弱国，我们要使它强大。我们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使它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所以我们去西方学习。

二是受“工读主义”思潮的影响。“工读主义”是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受国外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互助论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新村主义影响，而提出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他们主张劳心与劳力相结合，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把工读互助团办成“人人工作，人人读书，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新组织，各地的这类小组联络起来，实行“小团体大联合”，创造一个新社会。《邓小平传（1904—1974）》（上）就持这样的观点，说“他多少受到了当时青年学生中‘工读主义’思潮的影响。”

三是家庭经济困难。《邓小平自述》记载，邓垦谈到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情况时说：“1919年下半年，大哥已在念中学了，由于欠了很多债，我父亲长期不在家，上学交学费都很困难。”对于留法勤工俭学这件事，“我父亲呢，极力主张，我母亲舍不得，不赞成。大哥很愿意去，加上家境困难，听说能出去留洋，也都做母亲的工作”，最后还是说服母亲勉强同意了。邓希贤1926年1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述也记载：“到了法国什么都解决了，一则可以求学，再则可以找钱”。

1919年夏，邓希贤收到在重庆的父亲捎来的口信后，说服了不愿意让他出洋的母亲，和族叔邓绍圣、同学胡伦一起去重

庆。据《邓小平传（1904—1974）》（上）记载，邓绍圣和胡伦“比邓小平大一些，后来都参加了革命”。胡伦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重工业方面的领导工作，曾担任过政协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于1977年9月1日在重庆病逝，邓小平还以个人名义委托重庆市委领导送了花圈。关于邓绍圣，1984年2月28日，据邓办转给广安县人民政府的材料说：“邓绍圣是和他一起去法国的，1925年在法国入党。同年底一起去莫斯科，就读于中山大学，后来听说回国。回国后的情形不详，多半是病死或牺牲了。应按烈士处理。”广安县人民政府根据邓办指示，于1985年追认邓绍圣为革命烈士。

邓希贤一行三人风尘仆仆地赶到位于重庆市中心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时，学校已在9月初开学，但他们还是被学校录取了。据他当时的同学、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的江泽民（又名江克明、非曾担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在《留法、比勤工俭学的回忆》一文中说：“邓小平是稍晚才进入这所预备学校的。他那时就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

学校由于设在一座孔庙里，又称夫子祠，其设施简陋，学生一律走读，食宿自理，学制一年。学校设有法文、代数、几何、物理、中文及工业常识等科目，让学生初步懂得法语并掌握一定的工业技术知识，为赴法勤工俭学作准备。

邓希贤、邓绍圣和胡伦在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和其他同学一道，于1919年11月17日、18日参加了抵制日货的运动。《胡伦传略》记载说：“我们预备学校的同学，为了抵制日货，反对卖国贼，曾经集体到重庆卫戍司令部去示威请愿，在那儿坚持了两天一夜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结果。……时代的脉搏，爱国的思潮在冲击着我们的头脑，广大青年学生和

各界人士高昂的爱国热情，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上）一书中也回忆说，邓小平“参加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对于他以后的世界观的形成和革命实践活动的进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和意义”。

经过一年的努力学习，包括邓希贤、邓绍圣和胡伦在内的83名学生合格，他们于1920年7月19日参加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典礼。这些学生大部分为贷费生，由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提供300元路费和其他费用，包括邓希贤在内的另一部分学生为自费生，其父为他多方筹集了百多元路费。接着邓希贤通过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及体格检查，取得了赴法勤工俭学自费生的资格，并办理了相关手续。其后邓希贤回广安向家人辞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广安。

三、赴法勤工俭学

1920年8月28日，邓希贤等80多名同学在重庆登上法商吉庆洋行的“吉庆”号客轮，启航出川，驶往上海，并于9月5日到达，之后由上海华法教育会安排住到名利大旅社。1920年9月11日，邓希贤一行人从上海黄浦码头登上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所乘坐的是四等舱，实际上是专为留法学生临时设立的货舱。

邮船经过香港、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新加坡、印度洋、哥伦布（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阿拉伯海、红海、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于10月19日抵达法国马赛港。巴黎华法教育会用汽车来迎接邓希贤一行人，并于10月20日把他们送到位于巴黎西郊的华侨协社即华法教育会所在地。江泽民在《留法、比勤工俭学的回忆》一文中也回忆说：“第二天我们来到巴黎，受到了许多勤工俭学学生的欢迎，其中就有在一年前就到法国

的聂荣臻同志。我们在异国相逢，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和亲切之感。”其时和邓希贤一起勤工俭学、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元帅军衔的聂荣臻，与邓希贤在巴黎相识之后，共同历经了72个春秋的革命和建设的风雨历程。

1920年10月21日，根据华法教育会的安排，邓希贤等20多名同学到达距巴黎270公里、位于法国北部诺曼底大区的小城巴耶，并在巴耶中学开始寄宿制生活，邓小平的学号是1421。中国学生在这所学校单独开班，主要是学法语和商贸，并且作息时间管理严格。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上）一书中回忆说：“有一次父

亲告诉我们，学校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每天很早就要上床睡觉。他还说，那是一家私人开的学校，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坏。”

尽管巴耶中学的相关费用比起巴黎等地的学校要相对低一些，邓希贤生活得也很节俭，但到了1921年3月，他身上所带的钱还是



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邓小平

快用完了。这时巴黎华法教育会由于勤工俭学人数不断增加而面临经济困难，于是发出了两次通告，宣布该会与勤工俭学学生不再有组织关系，截至3月15日断绝与这些学生的经济关系，不再资助失学的学生，其后他们在法国的所有费用由自己承担。

1921年3月上旬，邓希贤等20多名在巴耶中学学习的同学面临着失学的危机，他们多次向校方交涉，法国教育部也致函校方要求减免部分学生的费用，但均被校方拒绝。再加上家里经济拮据，已无法提供学费，邓希贤只得离开学校，另谋出路。这样从1920年10月底到1921年3月，邓希贤在巴耶中学学习时间不过5个月，便结束了在法国的学习生涯。

1921年4月2日，邓希贤等同学由华法教育会介绍到法国南部的重工业城市克鲁梭，进入法国最大的军火工厂施奈德钢铁厂做工，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邓希贤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做杂工，在温度高达40度以上的炉前拖送钢条，工卡编号是07396。这种工作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非常危险，如果轧钢机发生故障，被轧的钢条就会向外弹射，很容易造成伤亡事故。邓希贤在施奈德钢铁厂做工，工资微薄，所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100多法郎。他不堪重负，于4月23日辞去在施奈德钢铁厂的工作，来到了巴黎。与邓希贤一起在该厂做工的胡伦后来在《胡伦传略》回忆以上情形时说：“在该厂轻轧车间拉红铁，每天随机器运转，分秒不停，又热又累，还要眼明手快，稍有疏忽，就被烙伤。”邓希贤后来多次对人说，他个子矮的原因就是在法国做工时干活太累和吃不饱饭而造成的。

近一个月的勤工俭学实践，是邓希贤人生的一段重要经历，使他初步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体验了工人阶级遭受压迫和剥削的苦难处境。邓希贤亲身经历了大机器工业生产，开阔了眼界，可以说是接受了一次西方工业文明洗礼，也是对